

“新南方写作”： 为什么是“南方”？

『南方以南』意味着什么

□刘欣玥

比起对既有文学事实的归纳，或对某种内涵与外延都清晰的写作现象的命名，“新南方写作”更像是一种询唤结构。它仍保持开放和未定型的状态，在行动中自我解放，在越界中逃逸。正如“南方以南”这一短语中包含的语势，它朝向一种流动、混生、不断自我拓殖与增量的文学理想。

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场中，如果抛出这样一个提问：与诸种“南方以南”的复杂经验相匹配，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人物形象是谁？最佳答案极有可能是：一只生活在晚清的雌性巨蛙，是的，它甚至“不是人”，没有现实维度上的原型，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文学虚构。创造出这一非凡形象的小说家林棹，未必必共享有关“新南方”的种种理论自觉或问题意识。这种无意识反倒更凸显出内在于“新南方”的敞开幅度与逃逸本能。小说《潮汐图》中，巨蛙的开场自如如同一则令人惊悚的谶言，它宣布自己尚未定型：“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因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过许多名字，它们一一离我而去，足以凑成我的另一条尾巴。”

巨蛙一生的流离飘荡，始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置家，它的结局，是消失在方寄往欧洲帝国博物馆的巨大冰块中——在19世纪逼真的海陆版图上，虚构者将她的权利行使彻底，创造出汉语写作的奇观景观，再如魔术师般轻轻抽身离去。巨蛙一生中得到的各种名字，则无不是对人类模仿造物主行使命名权的反讽：蛙仔、蛙怪、灵蟾大仙、Polypedates Giganteus、老蛤蟆、从大唐帝国远道而来的巨蛙太极、湾镇巨蛙……人类带着好奇、多情、幻想和误解，用语言在巨蛙身上展开文化权力或文明暴力的撕扯掠夺，到头来，不过都成了巨蛙终将摆脱的“断尾”。最终，没有任何一种命名能统摄它、揭示它“是什么”。这与“新南方”所处的话语生态何其相似，似乎已经足够说明“新南方”的文学生命力与诱惑力何在。比起对既有文学事实的归纳，或对某种内涵与外延都清晰的写作现象的命名，“新南方写作”更像是一种询唤结构。它仍保持开放和未定型的状态，在行动中自我解放，在越界中逃逸。正如“南方以南”这一短语中包含的语势，它朝向一种流动、混生、不断自我拓殖与增量的文学理想。

这要求我们调整认识的坐标系。“新南方”有别于传统地方文学、方言文学之“新”，正在于摆脱“南北文学”的传统讨论框架，超越了“北方—南方”的二元逻辑。“南方”的身份主体，不再依托“北方”、中原政治权力中心的压抑、忽视或是浪漫化想象。它落实在世界地理、海洋史、贸易史、殖民史与文化交往史之中，在全球性的坐标轴与取景框中，洞开认识“南中国”或中国的主体性的新视野。“若将圆心扎在岭北大地，将视野的半径限制在短短一截之内，采取单一的标准、价值观，‘蛮荒岭南’故事之诞生也就不足为奇。要是把圆心移至南方海域，半径拉大，更换或增加多元的标准、价值观，就能得到面貌不同的故事。”如林棹在《听古，讲古，驳古》所言，在蒙昧、原始的“蛮荒岭南”与开放的“千年商港”之间，尚有大片值得文学介入的地带。如果在封建帝国政治版图上，岭南是“南蛮缺舌”或“山高皇帝远”的边缘，那么，在取道海洋的寰球航图卷里，却是得风气之先，是中国与世界相遇的前沿。

不妨以语言为例，离开“新南方”的声韵，“新南方”的神韵与诗学将难以真正地谈起。这只乌有之蛙生在一个怎样的南中国，它说怎样的语言？“我会说水上话、省城话和比皮吹英文好得多的英文。一点澳门土语。对福建话、葡萄牙话、荷兰语有一定认识。认得十几个字。”《潮汐图》所呈现的晚清，恰恰与粤语书写史上最为兴盛的段落发生重叠。在民族共同体将立未立之时，使用粤语为主的广州，是日益强劲的通用语尚未能完全触及的地方。“寰球词与物，尽在此间搁浅”，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下，这是一个新词激增的年代，更是一个拒绝陈腔滥调的年代，这为粤语文学书写的繁荣提供了生机。根据学者李碗薇在《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中的梳理，方言字的创造、说唱文艺的出版和流行，加上外来传教士的推波助澜，“这种特殊的文化优势，使粤人可以成为能说又能写的‘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有力地支撑晚清及以后的粤语书写”。但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较之吴语地区，同为强势方言区的粤语地区文学经典的生产却长期陷入沉寂。可以说，《潮汐图》的出现，用多音、杂语的复调书写，回应了超乎期待的粤语对汉语写作实践的突破，也展示出泛南方语系对于汉语写作的充分在场。

当然，也带来了不小的阅读挑战。尤其是粤方言密度最大的第一章，陌生的粤方言字、方言词与神秘的巫语唱段带来的视觉、听觉眩暈，对于当代的小说读者，不论是来自粤方言使用区，都是一种大胆的冒犯。但也如同乘船出海，适应了最初的颠簸后，是畅游未知水域的大畅快。再没有比“拆肺，换腮”更贴合这种阅读体验的——“你拆肺，换腮，绿的声音灌满你，你什么都看见了。”认识南方走出后的瑰玮新世界，需要跳出旧语言秩序与感官系统，从惯习的汉语小语感中突围，让读者与作家缔结新的语法与美学契约。在文白相间、新词与旧语、方言与国语的语体混融与互相活化的之中，林棹探求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范式。《潮汐图》当然无法再以狭义的“方言小说”或“地方小说”来涵盖，它是诞生于21世纪的当代汉语小说。

不得不单独提及的还有植物的维度。尽管对“新南方”下本质化的定义都让我心生疑虑。但在亚热带向热带过度的气候带与自然植被带上，南方潮湿且葱郁，植物的盛大气象，是如此自发且强烈地扑来。人与自然相纠缠、与植物彼此深深嵌入的共生经验，使得南方的生境，不再是失焦的、模糊一团的舞台布景。它构成这样一种写作事实，人借助植物获得重新丈量时间与空间的标尺，植物塑造着人的记忆与欲望，定义着人对生命的理解，让抽象的经纬度数字具象化为生命形态。林白《北流》卷首的长诗《植物志》，没有标点符号的植物学名的绵延如同植被族群自身的绵延，“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岭南常年常绿的植物，营造一种看似无止无休，看不见起点与尽头的时间感，有时候要借助外力的撞击，才能找到一个文学转换的入口。在《北流》中，李跃豆闯入异乡香港，意外地重新寻回失落已久的北流语。与粤语系母语一同复苏的，还有儿时烧狼崽的气味，此后是源源不绝的人面果树、龙眼树、芒果树、凤凰木伴随着革命年代记忆的回涌。林白将这种生命体验，比拟为身体里永存着的一根刺，植物与血肉长在一起的刺。在熟悉到模糊一片的浓绿里，识别、指出那些略显陌生的陌生学名，实则是刺穿黏连成团块的记忆，唤醒被压抑的官能与情感的秘径。

同是经历现代性过程与历史激变，物候的变换相对更缓慢，有自己内在的秩序。植物会被砍倒也会复生，散发着看似被动、脆弱，实则古老、顽固的反抗能量。近年来南方写作中博物学意识的兴起，带来更大的时空尺寸下对于“变”与“不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丰饶的物候，也带来对平等、多元的生命情状更近乎“本能”的尊重和容许。如果将“新南方写作”比作一口巨大的生态缸，那么，在女性与孩童经验、弱者书写、去人类中心叙事等诸多层面，它确乎已经释放出可见的潜力与优势。植物给人的启示，不只是关乎“万物有灵”的朴素敬畏心，也不只是始终警觉于宏大话语包裹下的结构性权力关系，更持续生产着毫不示弱、原始的原始求生欲望与对抗声音。《北流》里李跃豆重返花葱绿的北流，在植物的激活下，再造完整的母系氏族与女性独立经验。《潮汐图》中巨蛙与数名养父人的情谊，与贱民窟家女娶家姐的养育与报恩，与十三行平民画师冯喜的友情，与孤儿迭亚戈漂洋过海的相依为命，无不超越物种，反照人性，如细弱的水系向珠江、向南中国海和大西洋汇流。巨蛙的身上，浓缩了帝国时代被笼罩在战争、监禁、杀戮阴云下所有花木珍禽奇兽、女性、有色人种、贫弱者的命运。相比于受限于生老病死的人类，巨蛙是幸存者，它得到小说虚构的庇护，因此肩负起更恒久的文学责任与记忆伦理。“我要看见，记住，我要活得长久，我要双目圆睁，哪怕变成囚徒（我已经是了）、标本、摄青鬼，我也要从严笔、博物馆、旷野永恒地看。”如此，重申一种多元平等的共同体与共同语的文学可能，也是虚构者一边泅渡、一边创造“南方以南”时所朝仰的远景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本报7月3日刊发的《杨庆祥：在流动中识别自我和世界》一文中，杨庆祥提出，理想的“新南方写作”应该具有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等特征。不久前，由《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的“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研讨会上，这一观点收获了在场学者的共识。本期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石岸书、刘欣玥，围绕“新南方写作”为何出现以及有何表现这两个话题展开讨论。石岸书关注“新南方写作”兴起背后的社会、历史等原因，尤其聚焦历史剧变、地理重组是如何催生了“新南方写作”，更主张将其置于更长远历史与地理变化中进行理解。刘欣玥的《“南方以南”意味着什么》重点关注“新南方写作”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以林棹的《潮汐图》、林白的《北流》两部长篇小说为观察对象，发掘“新南方写作”与南方地带独特的语言环境、生态环境等的关系。

两位学者都强调了“新南方写作”的变动性，在变动中如何整合、延伸和连接，进而开辟更广阔、更具未来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传统，或许正是“新南方写作”正在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 行超

“新南方”在流动与重组之中

□石岸书

“新南方写作”以当代中国的“新南方”为立足点，直面新的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在新的地理关系、社会流动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中，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

“新南方写作”展现出了一种想象世界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性与“新南方”被纳入全球化的方式有关——它一方面与北方产生普遍的连接，另一方面与东南亚存在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关系。

近几年“新南方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不过，什么是“新南方写作”的新颖性与规定性？考虑到今天归之于“新南方写作”的作品风格各异、范围甚广，这一问题似乎直接关系到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以我粗浅之见，“新南方写作”的新颖性与规定性或许需要与我们时代的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关联起来。

我们可以先迂回地从美国南方文学开始讨论。作为南方文学的旗帜，威廉·福克纳曾将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与南方文学的形成联系起来。他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自己的那场灾难（指南北战争）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南方，才会涌现出优秀的文学创作，那样的文学创作质量确实不错，使得别的国家的人都开始谈到出现了一种南方‘地区性’的文学。”（福克纳《致日本青年》）相关研究也佐证，美国南方的失败与北方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南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多重剧烈转型，诞生了美国的“新南方”。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就没有美国的“新南方”，就没有美国文学史上的南方文学。是历史的剧烈变动，创造了作为文学地理的美国南方，创造了南方文学。

这里并不是要牵强地将中国的“新南方写作”附会美国的南方文学，只是想借此表明，历史剧变、地理重组与文学流变之间存在一般性的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新南方写作”也具有启发性。

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

那么，“新南方写作”可以与当代中国什么样的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联系在一起呢？

形构当代中国的“新南方”的历史剧变，或许可以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与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正是“南巡讲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剧烈重组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地理格局，进一步将“南方”确立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此而后，以广东为核心地域的“新南方”，更快更早地作为南方地区融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之中。在国内，“新南方”的形成也以内部地理关系的重组为条件，这种重组尤其是指中心与边缘

的形成，例如广东与广西、湖南、海南等南方省份的关系。这种内外的地理重组同时是经济秩序的重组，也是社会流动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的重组。就社会流动关系的重组而言，广东成为外来人口流入的中心；就文化互动关系的重组而言，粤语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引领性的地域文化。

当代中国的“新南方”的新颖性或许就来源于这种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围绕着广东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流动网络和文化互动网络及其基本边界，或许构成了“新南方”的规定性。

从此出发，“新南方写作”可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也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它以当代中国的“新南方”为立足点，直面新的历史剧变及其引发的地理重组，在新的地理关系、社会流动关系和文化互动关系中，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

在这意义上，“新南方写作”可以追溯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大潮中涌现的广东打工文学和广西三剑客。打工文学从打工者的视角直面自身在经济—政治秩序中的底层身份与地理—社会秩序中的边缘位置，广西三剑客则从“新南方”的边缘地带感受中心所刮起的风暴是如何搅乱在地的日常生活秩序。对于打工文学来说，广东作为“新南方”的中心，是由无数工厂、高楼、机器与汗水、眼泪交织而成的森然耸立的整个世界，在它的周边附着着的异乡人群、外地文化与同乡网络，从郑小琼的诗到王十月的小说，无不瞩目于此。对于广西三剑客及其后的广西作家来说，广东也经常叙事中出没，时而是出走的终点或回归的起点，时而是叙事的伏笔或隐没点，时而是人物转变和故事发展的契机；作为他的广东时常超出地缘关系，内在地成为缺席或不缺席的在场者，从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到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在凸显此点。总之，两者都直接呈现了“新南方”内部的经济关系与地理关系的重构及其最初后果。

就此而言，“新南方写作”首先可以整合两个扎根于“新南方”的写作脉络：以广东打工文学为代表的底层写作和以广西地域性文学为代表的在地写作。它们都是赋予“新南方”以新颖性与规定性的历史剧变和地理重组所同时激发出的两个互相交织的面向。

近几年来，葛亮的《燕食记》和林棹的《潮汐图》为代表的作品出现，为“新南方写作”在底层性和现实性的基调上增添了文化和历史的新维度，赋予了“新南方写作”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清晰的整体性。也正是经由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南方”的形成有其漫长的前史，它在近代以来便置身于全球性的经济流动、国族冲突和文化交往关系之中。

“新南方”不仅在历史上是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当代也同样如此。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和朱山坡的《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等作品中，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讯息如此深入地改变着打工者与偏僻小镇青年的命运，“新南方”内部最封闭的空间似乎都千丝万缕地与最全球化的地域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或许是“新南方写作”中所呈现的与东南亚的关系。例如，朱山坡的《越南人阮囊羞》和林森的《抬木人》都不约而同地处理越南女性与中国男性的夫妻关系的缔结与离析。经由这一婚嫁关系的

转喻，中越之间复杂的历史症结、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得以或隐或显地牵连而出，这种关系的书写，极少在其他地域的作家中看到。可以说，“新南方写作”展现出了一种想象世界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性与“新南方”被纳入全球化的方式有关——它一方面与北方国家（地区）产生普遍的连接，另一方面与东南亚存在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这是“新南方写作”需要整合的第三个扎根于“新南方”的写作脉络。

全球化背景下 新的文学地理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扎根于“新南方”的三个写作脉络，多向度地赋予“新南方写作”以整体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冷战终结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南方”的总结性写作。正如“新东北作家”也同样是这样一种总结性写作，区别只在于，“新东北”与“新南方”在这同一个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的进程中处在不同的结构性位置，激发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后果和文学回应。

最近一些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剧变与中国发展阶段的变迁，也导致了形构“新南方”的内外关系发生变化。在外部，“新南方”与北方的结构性关系有所松动，与南方国家（地区）的关系则日益深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关系在不断加强（例如，东盟如今已是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内部，“新南方”的中心与边缘的旧有关系也有所调整，“新南方”正处在新转型之中。在这一趋势中，“新南方写作”不仅可以是总结性写作，也可以是开端性写作。它第一时间直击“新南方”参与当代中国突破原有全球秩序的诸般努力，也及时地聚焦“新南方”与其他南方国家（地区）正在深化和加强的经济和文化连接。在这一新的区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已初具雏形，“新南方写作”完全有潜力进一步召喚、形塑和丰富它。

黄锦树、黎紫书等马华作家为代表的华语文学，或许可以放置在这一新的趋势之中理解。像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开往中国的慢船》和黎紫书的《流俗地》等作品，或天马行空，或细水流长，勾勒了华语文学的另一风景，中国与东南亚那些剪不断的历史渊源由是尽数显露。然而，他们的作品不应该也不可能放置在“新南方”原有的内外结构性关系之中，而亟须在“新南方”所置身的全新的历史进程、更为开放和深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关系之中理解其意义。就此而言，“新南方写作”所展望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地理理想，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想象和世界想象。

在如今我们所身处的新的历史变局之中，“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恰逢其时。问题或许在于，不应该通过切割、分离的方式来凸显“新南方写作”的特殊性与规定性，而应该通过整合、延伸和连接的方式，将“新南方写作”置于更长远历史剧变与地理重组的进程之中。一旦在这一进程中恰切地自我定位和潜能释放，“新南方写作”不仅将确立更为清晰的新颖性与规定性，也将开辟更广阔、更具未来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传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学院讲师）